

# 日本“十五年战争”论的前世今生

伊势弘志

## 引言

本文旨在通过在学术史中的使用方法和问题意识的变化,来考察曾经在日本近现代史中使用的历史名词——“十五年战争”。

关于战争,使用何种词汇称呼,与如何理解过去的战争这样的日本的历史意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世界史中如何定位?怎样认识与其他国家历史认识的不同?本文在特别注意理解这一系列深刻问题的同时,尝试对日本“十五年战争”论的形成及其问题点进行整理<sup>①</sup>,并就教于方家。

## 一、“十五年战争”与问题意识

所谓“十五年战争”,是对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历经日中战争,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大约15年间的历史过程,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的一种称呼及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特别强调,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战争是连续的、密不可分的,中国大陆是主战场,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中国人民。

“十五年战争”这个说法最初是由评论家鹤见俊辅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sup>②</sup>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说法也未广为人知,而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被大家所熟知。以岩波书店1968年出版的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为发端,江口圭一<sup>③</sup>、藤原彰<sup>④</sup>等人也相继在研究中使用。“十五年战争”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都是针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实行的侵略战争,在揭露战争中的残虐暴戾行为的同时,也认为《治安维持法》等战前、战时的日本国家体制存在问题。

以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发展阶段论为基础的政治性极强的战后历史学,是战后日本史学界的主流。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战后历史学中,焦点大多集中在对天皇制法西斯、垄断资本主义结构和性质的讨论上。但是,1982年的教科书问题引发了战争责任论以及对战争的认识问题。当时,有媒体报道,在教科书中日军的侵略被改写成了“进入”。到底如何评价九一八事变与日中战争,二者性质是否相同,这都需要继续探讨。

<sup>①</sup> 关于“十五年战争”论的基本内容,参见『日本歴史大事典』、小学馆、2000年、第2册451页。

<sup>②</sup> 鹤见俊辅「知識人の戦争責任」、『中央公論』1956年1月号。鹤见将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都归结到了“十五年战争”的范畴中。

<sup>③</sup>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史研究の課題」、『歴史学研究』1982年12月号;『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86年。

<sup>④</sup> 藤原彰『岩波全書 日本近代史Ⅲ』、岩波書店、1977年。藤原彰在此书中阐明九一八事变是“十五年战争”的起点。

战后历史学要想说明日本一系列侵略活动具有连续性,就必须站在受害国的立场上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并有必要解明对亚洲实施侵略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要明了针对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的侵略活动是如何扩大的问题。因此,对统一看待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这段历史的“十五年战争”论,需要重新探讨。其中,江口圭一认为,未能如实地反映战争中的悲惨状况是教科书的最大问题,应该从以往的日中战争研究中寻找引发教科书问题的原因。<sup>①</sup>

江口圭一不仅是引领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亲身经历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由繁盛走向衰退的学者。具体来说,江口认为一直以来的“法西斯主义”论和“民众史观”都存在问题。

譬如,尽管在现实中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政策上的诸多不一致,但依照“法西斯主义”论,日本统治阶层都是整齐划一的,甚至有人认为天皇制简直就是为了侵略他国而存在似的。不仅如此,在民众史方面,都是描写先进的、对近代权利意识敏感的民众,却忽略了民众究竟对战争提供了多少支持。江口使用“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江口以“十五年战争”论为基础,针对强调“天皇制绝对主义”优越性的“法西斯主义”论提出了质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权力从纯粹的绝对主义,向以占据垄断资本优势的天皇制和资产阶级统治转变。<sup>②</sup>

因此,“十五年战争”论坚持并强调九一八事变与日中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之间的相互关联。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代表这就是从九一八事变不可避免地会扩大至日中战争,进而必然扩大至亚洲太平洋战争的15年。战前的日本并没有什么长期的构想或者蓝图,更何况原本预定的侵略并不是“十五年战争”。“十五年战争”论明确了日本在这15年中对时局判断的迷茫,迷走于不同意见冲突之间,最终走向破灭战败的结局。我们必须具有把握反复变化的时局的历史学问题意识,而不是生硬地直线性地思考日中间的战争。

以上所述的“十五年战争”史观,从提出到作为一种观念被认知,这个过程与对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积累及反省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下面我们先来按照江口提出的问题思路,来确认对战时研究的进展。

但是,在研究的发展中,对战争的称呼不一定表现了战争的历史性质,其中强调包括日中战争在内的“太平洋战争”的说法就是其中一例。还有些论者,虽说不会使用那些可以掩盖战争侵略性质的称呼,但也认为战争的称呼不一定非要和史观相结合,不要用名称来束缚研究内容。<sup>③</sup>

## 二、“两面帝国主义”论——在历史教科书和战争形象的背景之下

在江口圭一频繁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一说法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以“祖国防卫论”、“自卫战争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史观”在日本社会被广泛宣传的时期。自由主义史观将重点完全放在强调苏联(俄罗斯)的侵略性和威胁上,完全不讨论日本军部的扩张企图和侵略性。当时学术界的主流立场当然是与这种自由主义史观相对立的。但是,即使学校的教材中说明日本的战争是侵略和掠夺的战争,也没有关于侵略实际状态的描写。在当时大多数的教科书中,虽然会提到过去的战争是围绕朝鲜、“满洲”的统治权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其中强调更多的是日本国民深受军事动

①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の教科書記述と検定」、『季刊科学と思想』第47号、1983年1月。

② 这一立场在江口圭一的『都市小ブルジョア運動史の研究』(未来社、1976年)中较为明显。

③ 信夫清三郎认为对战争的称呼关乎史观问题,参见信夫清三郎『「太平洋戦争」と「大東亜戦争」』、『世界』1983年8月号。与此相对,齐藤孝认为称呼未必就是战争性质的体现,“十五年战争”的说法也只是指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而发动的战争时使用。参见齐藤孝『「大東亜戦争」と「太平洋戦争」』、『世界』1982年11月号。

员和赋税之苦的受害情况。不仅如此,教科书中几乎没有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大陆的相关叙述,所以就很难了解1941年以后的日中战争究竟是如何发展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982年教科书问题,使得对战争的认识被纳入到了社会问题的范畴。将侵略改为“进入”这一举动虽然遭到了战争受害国的抗议,但这说明了日本的战争认识开始被国外所关注,而且也明确显示了历史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的可能。有关殖民地统治责任的模糊叙述,以及对方似乎也要承担战争责任等相关叙述再一次出现在了1986年教科书问题中。日本大部分的学者都进一步认识到有关战争认识问题,不能只停留在研究的层面,更要将其贯彻到学校教育中去,江口圭一也是其中一员。

回顾以往社会上对战争的一般认识,从战争结束到战后复兴期终止,都很忌讳肯定或将战争合法化的做法。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的登场<sup>①</sup>,美化侵略,将侵略行为合法化的做法开始抬头。所以,那之后发生的1982年教科书问题,让人有种危机感,认为日本社会是不是正以倒退的方式缓慢前行(但是实际上,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中已经自发地加入了“加害”的视点,这也确实使得一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日本国民在战争认识上发生了变化)。

江口将成为问题焦点的“自由主义史观”的战争观分为以下四类:1.“解放战争史观”,认为亚洲各民族获得的独立是拜“大东亚战争”所赐;2.“殉国、英灵史观”,无法容忍将“护国英灵”看作是侵略者;3.“美英同罪史观”,不能接受只追究日本罪行(这一点尤其受到了原子弹爆炸的影响);4.“自卫战争史观”,认为战争只是自卫手段。<sup>②</sup>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问题背景下,江口认为具有能够充分传达战争悲惨状况的历史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提出了“十五年战争”史观。

他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是在考察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外交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其重要观点的“两面帝国主义”论。这个“两面帝国主义”论代表了江口学术的最高峰。

江口针对前述的将统治阶层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法西斯主义”论,在解释“两面帝国主义”论的特征时指出,日俄战争之后,由于日本作为军事大国所具有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英美的依赖上的,进而造成了“一面从属、一面侵略”的两面性,这就导致了日本的政策也出现了两面性,对外路线摇摆不定。<sup>③</sup>也就是说,江口没有简单生硬地去看当时的帝国主义,而是试图从把握反复出现变化的实际状态入手挑战既成理论。

1982年小学馆刊行的《昭和的历史》系列丛中,藤原彰、大江志乃夫、中村政则担任编委。其中的第四卷《十五年战争的开幕》由江口执笔。江口在文中描述了“两个对外路线”,以及“十五年战争”中的“两面帝国主义”论。

在“两面帝国主义”论中,将外务省、元老、宪政会、民政党划归为“美英协调路线”,他们以依赖欧美为前提,试图在中国获得权力和利益,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军部和政友会试图摆脱依赖状态寻求“自立”的这种姿态,被称为“亚洲门罗主义”(江口将日本通过在亚洲确立霸权以达到安定自立的这种姿态定义为“亚洲门罗主义”)。

江口分析说,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稳定,东亚各国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

<sup>①</sup>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是文艺评论家林房雄在《中央公论》连载中提出的主张,从1963年至1965年共连载16期。他在评论太平洋战争性质时,上溯至1853年美国打开日本国门,太平洋战争就是由日本进行的“解放亚洲”的战争。针对日中战争,他认为那是扭曲了亚洲“独立”理念的结果,造成了“亚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产生的悲剧。林房雄的主张是在当时日本战后复兴、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企图将过去合法化的风潮中提出来的,而且也越南战争之后,重新审视以反美情绪为基调的历史认识相关。他也提到并非全面肯定侵略战争,以及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参见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1964年。

<sup>②</sup> 江口圭一《日本の侵略と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95年。

<sup>③</sup> 参见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的美英协调派逐渐占据了上风。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发生,使得对英美的依赖减少,英美协调路线也随之崩溃,最终发生九一八事变,“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在明确经济体系带给外交的影响方面,以及统治阶层中由于世界认识的不同而引起政策变化这两个方面,“两面帝国主义”论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这一时代的研究引向追究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方向的同时,亦摆脱了以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的束缚。

江口的研究中,采用了两种手法。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史论》(青木书店 1975 年版)中看到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另一个是《都市小资产阶级运动史研究》(未来社 1976 年版)中看到的“以小资产阶级运动为中心的人民斗争史”。其中,与“两面帝国主义”论相关联的是前者一侵华史。在《日本帝国主义史论》中,江口针对“公然或是隐蔽、有意或是无意地试图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这段历史模糊化、合法化、隐瞒、歪曲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 三、“两面帝国主义”论的成果与批评的登场

江口的“两面帝国主义”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币原外交”的评价。一般来说,币原喜重郎的外交被评价为:对抗军部、展开协调外交、保持外务省的独立性。但是江口认为“币原外交”的根本就是“维护满蒙权益”的帝国主义外交。也就是说,币原外交虽不同于“亚洲门罗主义”的对外路线,但是在获得满蒙利益上却是一致的。江口分析认为在当时国内的政治结构中,“英美协调主义”和“亚洲门罗主义”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民众“排外主义”问题的重视。江口指出,日本国民的大多数都不认为侵略中国是罪恶的,热情地支持九一八事变这一事实正是日中历史间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对中国革命的危机意识和排外主义造成了国民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江口认为“下层贫民”是最恶劣的侵略者、加害者。除此之外,江口还分析说,军部以及报刊媒体的宣传及启蒙活动,随着支持战争运动的展开,酿成排外热,形成了“民众动员体系”。这可以说是江口将“人民斗争史”和“侵华史”两个题目结合起来的成果。江口在 1978 年阐述了“两面帝国主义”论的立场,明确提出有必要放弃或修正“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

“两面帝国主义”论认为,法西斯主义内部的分裂、对立是时刻存在的,在此之上,在对英美的依赖基础上实施的外交路线也存在分裂的情况。这对分析“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随着“十五年战争”论的确立,以教科书问题为背景,从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的连续性的观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认为九一八事变时期与日中战争时期性质并不相同的观点。

1962 年,学界已经出现认为应该将九一八事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分开来看的历史认识。<sup>①</sup>针对这种历史认识,藤原彰批判说将九一八事变和日中战争分开考察是错误的。<sup>②</sup>但是,随着“十五年战争”论的出现,有观点认为由关东军的一部分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军事政变,与大本营设置之后,在军部独裁体制下发生的战争有所不同。

藤村道生认为“十五年战争”史观是在“东京审判”的强压下产生的历史观,并且否定了“大本营设置后的军部独裁可追溯到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之后侵略中国的行动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

① 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戦争指導史』、時事通信社、1962 年。

② 参见藤原彰『太平洋戦争史論』、青木書店、1982 年。

爆发”的观点。另外,他还指出,以昭和天皇为中心的政府中枢尽心竭力地阻止军部行动,当时的军部在政治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sup>①</sup>也就是说,正如西园寺公望指出的那样,九一八事变只是军部中的一部分人发动的军事政变,与国家意志无关。事实上,日本政府的方针是“不扩大事态”,但是关东军无视此决定,继续将事态扩大,并建立了“满洲国”(日本政府最终在事后追认了九一八事变)。所以,他认为,这与之后遵照大本营的命令发动的攻占南京以及太平洋战争具有着本质的不同。

江口圭一则反驳藤村的观点说,仅仅以军部独裁体制尚未建立为由是无法否定“十五年战争”史观的。这是因为江口力图将武力侵略中国的实际状态展现出来。另外,藤村所说的军部在政治上的孤立也遭到了永井和的批评。在当时的日本,担当宪法、议会政治的主体且能够与军部抗衡的势力并不存在,由此来看藤村的意见未免牵强。<sup>②</sup>

江口认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者并不是以九一八事变为目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在于侵占中国全境,争夺世界霸权,所以他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前提就是将侵略扩大到“满洲”之外。江口这样的想法在《岩波讲座》中有充分反映。<sup>③</sup>

但是,重新认识“十五年战争”史观的要求并不仅限于此。在经济史研究方面,也出现了认为九一八事变时期和日中战争时期有所不同的观点。其观点强调,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才开始实施为摆脱因战时经济体制基础——棉制品出口量的增加,以及重化工业而引起的恐慌的措施。这种日本的“自律性经济恢复”的经济史的视点,被用来分析战争期间日本资本主义的强韧增长,也被用来说明战后经济增长的特征。<sup>④</sup>

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史领域也出现了强调战前日本经济强大的研究。比如,坂野润治就认为,日中战争发生时的日本已认为自己是具有经济实力的大国,战争的发生正是因为经济的急速增长,而不是因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落后、脆弱。<sup>⑤</sup>

以上观点虽不同于“十五年战争”论和“两面帝国主义”论,但是,在批判以把握历史的全体性、结构性为目标的战后历史学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日本的动向都朝向“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时,却都态度一致。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从事日本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将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不但具有局限性,而且“法西斯主义”论也未能将战争的实际惨状展现出来。

日本的历史学在泡沫经济的大背景下,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研究潮流,其中继承发展了“十五年战争”史的成分较多。由昭和天皇去世和冷战结束而引发的有关“历史终结”的讨论为契机,虽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被迫后退了,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反而加强了。

在“天皇制”研究方面,出现了从非“阶级斗争史观”的角度分析天皇制的研究。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支撑了天皇制?”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如果没有国民的自发性,天皇制就不会存续,而这正是“十五年战争”论的视点。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的法西斯主义研究只是说明掌权者一方的意图,在此反省之上,认识到了对民众支持和协助战争的实际状况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自治研究、城市研究也都得到了发展,市民、国民的形成问题以及“传统创造”论相继登场。在日中关系研究方面,开始有研究认为日本的战时外交,具有以与中国的关

① 藤村道生「二つの占領と昭和史—軍部独裁体制とアメリカによる占領」、『世界』1981年8月号。

② 参见永井和「一九八一年の歴史学界」、『史学雑誌』第91編第5号、1982年5月。

③ 江口圭一「日中戦争の全面化」、『岩波講座日本歴史(20)近代7』、岩波書店、1976年。

④ “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并不是直线推进的,以国外经济为背景发生动摇的状况,江口自己也是承认的。在野泽丰主编的『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论文集中,小林英夫、松本俊郎发表了有关日中经济提携外交的研究成果。

⑤ 参见坂野润治『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3 構造と変動 現代社会への転形』、岩波書店、1993年。

系为重点来展开对外交往的特点,当时中国问题的解决非常关键,与列强间的关系也是据此调整的。摆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世界史的视点,将日中外交置于国际关系构架之中的思考方式逐渐成为主流,这一点在通史的叙述上也有所反映。

另外,那之后的“战争责任”论以及战争认识问题继承了“十五年战争”的视点,发展了对侵略过程的分析。这可以说是“十五年战争”论的最大贡献。藤原彰、山田朗等人揭示的有关战争中天皇积极主动性格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有关战争责任研究的一部分。<sup>①</sup>

加害的实际状况也开始受到关注。如面向一般读者发行的历史杂志《别册历史读本 未公开照片中的日中战争》(新人物往来社 1998 年版)揭露了日军暴行、慰安妇的惨状,深刻反映了朝鲜慰安妇的惨状。另外,毒气、鸦片、“七三一部队”以及“南京事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sup>②</sup>,其中利用士兵的手记、日记等资料的研究尤为突出。江口自己也发表了有关“三光作战”、鸦片政策等研究成果。<sup>③</sup>

但是从结果来看,如果从世界史视点出发也可以发现“十五年战争”论的不足。江口提出的问题确实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了解把握对中国的实际加害状况。但若“十五年战争”论被人们所认知,并获得认同,而且在战争认识上有必要从世界史结构的视角把握的话,仅仅调查在中国发生的实际状况也是不够的,应该向下一步推进。

譬如,即便存在着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这段斗争相对平静的时期,也还可以称为“十五年战争”(“华北分离工作”如何评价、在东北的抗日斗争是否可被称为“战争”)吗?日中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方针由对苏外交决定,而对苏外交又由对德关系决定。所以如果不把握欧洲形势的话,也就无法理解这“十五年”等这类深刻的问题。站在国际政治研究的立场上来看,“太平洋战争”的说法因为有轻视对华侵略战争的意味,所以,并不合适。在继承了江口等人问题意识的同时,应该放弃使用“十五年战争”,采用“亚洲太平洋战争”或者“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说法。<sup>④</sup>这两个说法强调战争是“由日本发动的以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为战场的侵略战争”,凸显了对亚洲的侵略,进而取代“太平洋战争”的这一称呼——重点强调在太平洋主战场上输给美国财力物力的说法。

由这些批评可以看出,“十五年战争”论未必是具有高度国际关联意识的认识框架,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的江口在认识过程中当然也有不足。

总而言之,针对“十五年战争”这一说法的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重视九一八事变后的“塘沽停战协定”,尽管之后的战争有可能避免,但仍然走上了日中战争的道路。基于这样的对日中关系史的认识,反对将 1931 年后的战争全部概括为“十五年战争”。另一方面是站在国际关系史的立场上,认为“十五年战争”只重视日中间问题的看法有问题,日本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应将当时欧洲形势等因素也考虑在内。无论怎样,“十五年战争”论使得从总体上把握战争成为可能,但是 15 年间的非战争状态时期(九一八事变的终结、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和

① 藤原彰『天皇の昭和史』(新日本出版社、1986 年)、『沖縄戦と天皇制』(立風書房、1987 年)、『日本軍事史』上、下(日本評論社、1987 年)。山田朗『昭和天皇の戦争指導』、昭和出版、1990 年;山田朗『大元帥・昭和天皇』、新日本出版社、1994 年。

② 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殺 岩波ブックレットシリーズ昭和史 5』、岩波書店、1988 年;本多勝一『南京への道』、朝日新聞社、1989 年。

③ 江口圭一「中国戦線の日本軍」、藤原彰・今井清一編『十五年戦争史(2) 日中戦争』、青木書店、1988 年;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岩波書店、1988 年。

④ 木坂順一郎「十五年戦争の性格と戦争の呼称について」(盧溝橋事件五〇周年日中学術討論会における報告);副島昭一「日中戦争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歴史科学』第 102 号、1985 年。

终结、日中战争的开始)等不连续问题,以及忽略各个战争的特征,将其整体概括为一个战争体系也都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不仅如此,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十五年战争”论,可以说包括江口在内,虽然重视加害状况的考证,却缺少对中国本身状况的考察。对于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外交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军阀割据、国内统一、外国干涉等“中国问题”才是大前提,但是“十五年战争”论并没有对那些问题进行积极的分析。<sup>①</sup>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是经济大国”已成为普遍共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天皇制以及近现代史残存着“半封建性”的解释,在这时已经不再有效。处在这一思想潮流的过渡期,将研究向前推进的“十五年战争”论,虽然提出了战争加害视点,以及从世界史构造方面把握历史的必要性,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仅其历史使命走向终结,作为用语的一般性也受到了质疑。

近年来,有研究认为1925年普选制度的实施是现代大众社会的起点。酒井哲哉对“十五年战争”史观提出质疑,他认为正是“华盛顿体制”遭到破坏而导致政党内阁制崩溃,由此可见,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国内政治变动紧密相连。而且,他试图通过分析因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日本国内危机意识的变化过程,揭示九一八事变与日中战争的非连续性。酒井不仅继承了对“十五年战争”史观的批判,而且重新审视了以九一八事变为界的“近代”与“现代”的时代划分。<sup>②</sup>另外,则有学者更重视战时的转折点及其变化,站在否定“十五年战争”论的立场上,认为根据时代划分而得出的生硬的历史观存在问题。例如,加藤阳子认为二二六事件后出现的现役武官制的复活正是陆军的组织改革措施,古川隆久则指出卢沟桥事件以后日本国内出现了避讳军部的现象。<sup>③</sup>

#### 四、“相互依存”的分析概念

以上回顾了“十五年战争”这一说法的作用,以及相关的问题点。为了更好地理解江口的研究,笔者想进一步探讨江口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两面帝国主义”论。

如上所述,“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因为缺乏与国际相连的视角,作为一般性概念不被认可。但是,根据江口的解释,“两面帝国主义”理论是“十五年战争”论的最根本所在,其本身的历史研究手法就存在问题。那就是江口在解释国内政治结构时所依据的“相互依存”概念。

“两面帝国主义”论揭示了经济体系对外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政策主体间认识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政策出台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向大陆侵略路线“亚洲门罗主义”倾斜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民的支持,本应存在于两面性政治结构之外的国民正是导致两面结构崩塌的主要力量。可这一理论模式并不完整。

为何下此结论?那是因为,“两面帝国主义”论本应提出其分析模式,但是“从属与侵略”的对立结构图究竟是怎样崩塌的?是怎样演变成单纯的侵略的?关于这些几乎都未作说明。

① “十五年战争”论未必可以决定研究者见解的高低,江口圭一、藤原彰、今井清一等人对“十五年战争”论持肯定态度。以下诸位也是同意“十五年战争”论的:栗屋宪太郎、黑羽清隆、由井正臣、吉田裕、山田朗、森章博、西野留美子、千本秀树、高群逸枝、广玉琦、伊香俊哉。从教育者的立场来讨论的还可以举出石山久男。日本历史学界没有明确地根据是否同意“十五年战争”史观划分阵营,这只是笔者的个人划分。另外,这也是从当时的研究来判断,并不是根据现在的立场做出的。过于简单的分类恐怕不太合适,这里只是为中国读者便于理解提供参考。

② 酒井哲哉『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論』、岩波書店、2007年。

③ 参见加藤阳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岩波新書、2007年;古川隆久『昭和戦時研究から日本近現代史を見直す』、大阪歴史学会編『ヒストリア』、2003年。

关于此疑问,可做以下推论。江口的“相互依存”的理论根据,也许来源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发表于1977年的“相互依存理论”(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形势趋于缓和,跨越国境的人与物的交流都大幅度增加,“相互依存”论被推上了国际舞台。“相互依存”论是研究“低层次政治”的经济社会领域,如何影响“高层次政治”的军事领域的国际政治学理论。

国际社会,国家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关系愈发紧密,任何国家(越是发达国家就越是如此)都无法孤立存在。国际政治的主体,不仅仅是国家,也跨越国界进行活动,其目的也不只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军事也不是国家唯一的政策手段,领域不同其政策也不尽相同。(譬如,纤维产业是美国的重要产业,在与他国的纤维问题上就不能使用武力解决。美国的军事优势是不能与纤维产业的优越地位相结合的)

“相互依存”论中特别关注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产业,各自的产业和企业之间互相依赖,在相互依存的当事者之间则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国家间的各产业紧密相连,国家或产业之间相互依存,不能选择拒绝对方,只能制定出与其相适应的复合型政策课题。

也就是说,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各国,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因此诸如世界大战那样的单纯对立已不可能再次重演,为了和平,世界应该不断地朝着相互依存的方向发展。

此理论不同于以往的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国际政治分析的“国家中心说”,可以说它是试图勾勒出包括非国家主体在内的世界动态的“多中心说”。重视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展示了国民国家的变化,暗示在核扩散的世界,现实主义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世界观并不通用。“相互依存”论比起依靠军事力量的古典“均势”论,更注重依据国家经济成长的消长来解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根据相互依存明确彼此间的关系。从“两面帝国主义”论亦可窥见“相互依存论”的思考方法。

江口认为“一面从属,一面协调”的国内体制就是分权体制,而这种分权体制正是军部、政治部以及宫中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产生的结果,这正好契合相互依存的概念。在江口的研究中,不乏“相互依存”这样的用语。可是本文指出“相互依存”论的影响并不单单是因为以上的理由。

最重要的理由是,自从1977年“相互依存论”登场之后,江口的研究内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1978年提出了“两面帝国主义”论。1977年之前的江口以资本主义研究为主,大多以经济大萧条、民众的废税运动、工业联合会等为研究对象。在战后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经济产业等方面成绩的江口,构建历史理论的理由恐怕只有这个了。

可以说江口试图描述人民斗争的研究,也是受益于相互依存分析框架,借助于国际视野,发展成的“两面帝国主义”论。“相互依存论”中的“低层次政治”的经济影响“高层次政治”的军事领域这一点更贴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日益衰退的战后历史学中,对于江口来说明示“经济体系给外交策略造成了影响”这一说法尤为重要。但是,政治理论转用于历史学时,实证研究的准确度尚嫌不足。

原本“相互依存”论是为说明跨国各产业间的关系和特征,描述构造本身的理论,并不涉及关系的崩溃。因为是以把握构造为目的的理论,所以并未设想一旦建造起来的结构会走向崩溃。

江口的“两面帝国主义”论中,“英美协调路线”的崩溃、“亚洲门罗主义”成立的原因,不得不认为是因为第三要素——国民的存在。之所以这样认为,就是因为江口依据的相互依存的理论中,不存在崩溃的理论。同样,在相互依存理论中,由于彼此依存的关系,事先设定为两个互相依存的主体,所以无论是“亚洲门罗主义路线”还是“英美协调路线”,从一开始就好像是自然存在。原本在20世纪20年代英美协调路线占据优势的背景下,应该分析评价原敬(政友会)的作用和影响,



可是江口对原敬几乎从未提及。

这种根据理论转用形成的“无视人的主体性”分析倾向,与之后展开的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问题也有关联。

## 结 语

江口的“十五年战争”认识,强调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过程的连续性,强烈要求在历史教育中加入对加害与被害的实际状况的描写。在另一方面,他一直坚持认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纯属偶然,并不是日军有计划的“谋略”。1987年6月由中国日本史学会主办,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万峰、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赵延庆、辽宁大学易显石等学者主张“卢沟桥事件是继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侵略战争的延续”,江口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卢沟桥事件与柳条湖事件并不相同,只是一次偶发事件。

之后,在卢沟桥事件上与中国方面理解的差异问题一直是江口的研究课题。对于“一步步排除国民党势力,其结果最后发生了卢沟桥事件。谁先开枪在历史记述中确实很重要,但不是决定事件性质的要素”<sup>①</sup>的意见,江口表示认同。

在日本也有观点认为“谁先开枪并不是问题,原本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才是问题所在,只是发生了该发生的事”,但是,在日本的研究史中,追求的不是那样的“理论”而是“实证性”,所以江口也不同意“侵略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此问题也与中日之间围绕《田中奏折》(1929年12月在南京发行的《时事月报》上,以《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为名刊载)的不同见解很相似。

江口的贡献在于,对战后历史学的传统历史问题的研究,以及20世纪90年代提出诸问题的过渡期的实际成果。当下,“十五年战争”的说法,以及其理论框架下的“两面帝国主义”论的有效性不再被认可。在讨论与“十五年战争”论相关的个别问题以外,一般情况下,“十五年战争”不再被用作学术用语,学校教育中也不再被使用。

但是,有关中国的受害,如果不就国际以及国内的责任问题达成共识的话,战争责任的问题将无法取得进展,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将此认识向一般民众推广,是江口的一大成绩,在研究史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教科书问题之后,亚洲各国要求日本认罪的呼声此起彼伏,对此,日本国内从未参加过战争的人们发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声音,江口一直致力消除这些对立情绪。江口认为,在历史教育问题上,仅靠确认战争的事实,无法确立历史的主体性,教育实践与学术研究之间若是一直保持距离的话,教育就不会取得进展。无论怎样,江口坚持认为不考虑中国的动向(抵抗、反侵略)就无法说明日本的侵略过程,在这一点上,江口具有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江口通过引领日本国内的研究关注侵略战争,为实现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和达成共识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个课题尚未完成。为了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热切希望贵刊把更多的日本研究信息介绍给中国。本文若是能为中国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信息将不胜荣幸。

〔作者伊势弘志,日本明治大学兼任讲师;译者葛睿,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高士华)

<sup>①</sup> 石堂清倫「満鉄と日中戦争」、『世界』1997年8月号。